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笔谈

逢锦聚 林岗 杨瑞龙 黄泰岩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外延、政策着力点等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形成高质量发展共识,编辑部特别邀请了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逢锦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杨瑞龙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分别从高质量的发展内涵、高质量发展的依据、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高质量发展与理论创新等内容进行阐释。

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高质量发展*

逢锦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①这是关于我国发展阶段具有创新意义的判断。做出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对这些问题理论界多有讨论但仍需深入研究。

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

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判断,体现人们对客观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进程认识的高度,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客观进程的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除个别年份外,事实上一直处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走过弯路,但取得的成就十分可观。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了国民经济,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在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实践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致力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符合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所处国际环境的。经济高速增长为我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强综合国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

* 逢锦聚,南开大学。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国家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等成绩的取得,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要素投入大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生产方式粗放而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人民生活改善相对滞后,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等。这些问题说明,持续几十年年均接近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宜持续,国民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要求作出科学的判断和相应的决策调整。

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改革和建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①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单凭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已很困难,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国际经验的借鉴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从国际经验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从不发达到达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经济高增长之后转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这几乎是一种客观规律。把握好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适时将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我国来说既是把握机遇也是迎接挑战的要求。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②迎接这样的挑战,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智慧,也迫切要求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鉴于上述,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提出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经济领域就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战略性创新判断。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的发展。发展为了人民需要,围绕人民需要而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到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人们认识的飞跃。高经济增长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并不反映投入产出的效率、经济结构的状况、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并不能很好反映人民从经济增长中是否得到益处。经济高质量发展则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强调效率、结构、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在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有可能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完全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强调经济在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重提高增长效率,改善经济结构,转变动力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特别要强调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②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根本标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与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同步。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制度体制机制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高经济增长的途径,可以主要靠要素的投入、资源环境和当代人美好生活的透支,也可以主要靠科技创新实现。回顾我国过去的高经济增长,虽然也有科技发展的支撑和效率的提高,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要素投入的增加,而科技创新和效率提高不足。高质量发展强调经济发展靠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靠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与高消耗低产出、靠要素投入增加实现高增长的增长方式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在今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效率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是国民经济比例、结构协调,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发展。社会再生产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保持合理的比例,现代化建设基本的趋势是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二次产业和三次产业的比重渐次增大,城镇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在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三次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重大比例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三次产业发展滞后、农村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制造业核心创新能力不强束缚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高经济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的发展、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在高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问题存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①

高质量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是一个整体,在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要全面兼顾各项基本要求,使之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措施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现代市场主体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现代绿色发展体系、现代全面开放体系、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等,也包括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的制度体系。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这一范畴以来,理论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界多有阐释。^①与已有的阐释比较,本文增加了现代市场主体体系和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并将现代分配体系作为分配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一起构成制度体系。其理由是:现代市场主体体系包括企业和居民,是重要的微观基础;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包括政府职能发挥和宏观政策在内的体系。微观基础也好,宏观调控也好,都是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缺少的。至于分配,包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无疑要有一套政策体系,但公平分配的关键首先是要把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政策则是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在世界范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然曲折,美国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仍在持续。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迫切要求。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再上新台阶。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统一整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统筹规划,一体建设。对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总体的思路: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同时,提出了六项措施,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项措施。^②这些措施,要在实践中逐一落到实处。

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速度*

林岗

尽管高速增长不等于高质量发展,但在经济增长过低的条件下,社会发展肯定不可能是高质量的,因为高质量的发展需要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较高速度的持续增加来支撑。近些年出现的增速下滑,是不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所以党中央提出在坚持高质量发展原则的同时,还要稳增长,即保持经济增长的较高速度。但是,对于未来能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实际经济工作者还是经济学者中,都有不少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以对我国未来经济条件的某些所谓“共识”为根据的。但是,这些“共识”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个“共识”是断言在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消失的条件下,经济增速必定以较大幅度下滑。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因素,是这个“共识”的另一面。然而,问题是这种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归结到人口因素上?实际上,在出生率持续下

^①参见刘志彪:《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重点》,《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七个部分:一是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三是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四是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五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六是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七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

降(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在 0.4%左右的极低水平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增长很慢的情况下,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是依靠劳动效率的提升。1991—20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始终高于 7%。特别是自 2001 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其年增长速度都在 8%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 14%。^①为了明确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比较一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过去 20 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1991—2010 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特别是自 2006 年以来,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 4%。^②这使我们想到尼古拉斯·卡尔多和西蒙·库兹涅茨这两位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总结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化或特征性的事实中,都将“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列在首位。卡尔多对这个事实的表述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并不趋于下降。”^③库兹涅茨的说法是,“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都高,且人均产出增长率更高。”^④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普遍规律的反映。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对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对卡尔多和库兹涅茨所揭示的这个规律的验证。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与人口因素有关联,但主要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大量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高人均产值即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快速提高的结果。如果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保持在十分低下的状态,其产出除了养活劳动者本人而所余非常有限,就不会有足够的储蓄用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劳动人口也就不可能大量转入高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总产量而向传统农业领域不断增大劳动力投入,结果只能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持续下降。与这种下降相伴随的,是经济的缓慢增长以致最终陷入停滞。同样,如果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低下状态,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共识”是认为我国投资率过高,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并据此主张将投资率降下来,进而断定投资率的大幅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增长速度的下滑。判断我国投资率是否过高,首先要看投资是否超过了储蓄。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多数年份,我国的投资率都高于 40%。根据 2000 年以来的历史数据推算,未来我国的总储蓄率虽然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低于 40%。这不仅比目前美、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高出约 20 个百分点,而且比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与阿根廷这样的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则要高出一倍。较高的储蓄率,为较高的投资水平提供了基本保障,而较高的投资水平则是经济以较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显然,从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来看,说我国投资率过高根据不足。

从效率的角度看,投资必须是高效的,浪费是不能允许的。但是,要做出关于投资效率高还是低的正确判断,需要搞清楚我国的投资效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国民经济的宏观投资效率,即固定资本的增加对 GDP 增长的贡献,可以用资本边际生产率(ICOR)来衡量。^⑤根据定义,ICOR 越高,单

^①劳动生产率数据以 201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GDP 除以劳动力数量得到。

^②计算方法为:设 Y 为生产总值,L 为劳动力数量,A 为劳动生产率,则 $Y=L \times A$;对上式进行全微分得到 $\Delta Y \approx \Delta L \times A + L \times \Delta A$;经济调整有 $\Delta Y/Y \approx (\Delta L \times A)/Y + (L \times \Delta A)/Y$ 。

其中, $\Delta Y/Y$ 为总产出增长率, $(\Delta L \times A)/Y$ 为劳动力增长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L \times \Delta A)/Y$ 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

^③Kaldor, N. (1963),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Hel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London: Macmillan.

^④Kuznets, S. (1973), “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3).

^⑤其定义是: $ICOR = I/\Delta GDP$, 其中,I 为当期固定资本形成额, ΔGDP 是当期 GDP 的增量。固定资产投资利润率也常常被用来衡量投资效率。这是从投资人所获收益的角度得出的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投资为社会带来的全部收益,因为投资不仅为投资人带来利润,也为在投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带来工资。此外,投资利润还会受到收入分配变化的影响,即由劳资关系变化决定的利润在净收益(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在净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利润率也会由于利润占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利润率不是衡量投资的宏观效率即投资与全部国民财富增长的关系的恰当指标。

位 GDP 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越多,即投资效率越低。在用 ICOR 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时,应当注意产业结构的影响。资本密集产业比重较高的国家,ICOR 普遍较高。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先进装备制造和其他重化工行业规模扩张、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时期,很容易出现 ICOR 指标提高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从 1990 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都大幅下滑,这是反危机强刺激措施的结果。如果剔除与两次危机对应的 ICOR 峰值,在 1990—1997 年的正常发展时期,ICOR 数值 8 年低于 3,而且多数年份低于 2;在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之间的另一个正常发展时期,即 2001—2008 年,ICOR 数值 9 年都低于 4,其中从投资率跨过 40% 的 2003 年到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的 2008 年,ICOR 数值 6 年持续低于 3。^① 在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随着投资率的提高,ICOR 数值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并未造成什么严重不利后果。相反,这两个时期都是以较低通胀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也正是我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资本密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间 ICOR 数值的有限上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良性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能用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来解释。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计算,从 1981—1990 年、1991—2000 年、2001—2010 年、2011—2013 年这四个时段,我国的 ICOR 分别为 2.25、3.05、3.19 和 4.02,而美国是 6.71、5.91、8.85 和 8.47,日本是 7.08、12.88、11.53 和 14.81,德国是 9.071、12.21、12.39、23.82,韩国是 3.30、4.69、7.32 和 10.66。^②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较大的投资规模加上投资的较高效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我国某些部门和行业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确实存在去产能的问题。但是,对于目前的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应当有全面的认识。与这些过剩产能相关的过去的投资决策,是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状况做出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是合理和必要的,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产能过剩,是相对于现在发生的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的萧条状态而言的过剩,并不是生来就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经过一段繁荣之后,总是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总会发生范围或大或小的“去产能”过程,出现过去年投资形成的某些固定资产的“湮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应当大幅度减少。相反,要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尽快实现供给侧结构调整(这意味着要开辟许多新的投资领域),同时帮助一些仍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去产能”导致失业过度增加和有用固定资产的不必要毁灭。遏制经济的持续下滑,投资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

第三个“共识”是认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变弱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跌。其理由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劳动力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丧失。这个理由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因为,考察国际竞争力不仅要在一国工资的绝对水平,还要看一国工资在国际上的相对水平,也就是要进行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可以把近 20 年出口额加起来一直占世界出口总额 60%~70% 的 27 个 OECD 国家 2000 年之后的平均工资数据,与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做个比较。2000—2011 年的 12 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 346%,显著高于 27 个 OECD 主要国家的增幅(实际平均工资的增幅位于 7%~189%)。但是,截至 2011 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仍显著低于 27 个 OECD 主要国家,仅为美国的 12%、日本的 10%、韩国的 25%。^③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已上涨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但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家比较,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非常明显,而且这种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下去。

^{①②}更详细的相关数据见林岗等:《2010—2030 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9~80 页表 2—12。

^③将各国平均名义工资水平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得到平均实际工资,并以当年汇率均值为折算标准将其折算为美元。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在作为我国潜在竞争对手的部分非 OECD 国家中,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实际平均工资明显高于我国,但增长速度较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目前实际平均工资水平略低于我国,但增长速度较高。至于亚洲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外,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实际平均工资均明显低于我国,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工资水平尤其低。如果仅就实际工资水平而言,这些国家对我国来说是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但是,在比较劳动力成本优势时,不仅要看劳动报酬水平,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观点,单位劳动成本(ULC)即平均劳动报酬对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是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的指标。2000—2011 年的 12 年,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由 0.243 增至 0.436,年均增长 6.7%,其增速与 27 个 OECD 主要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而且就 2011 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仅仅高于爱沙尼亚,略低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两国,较其他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仅为美国的 58%,日本的 40%,韩国的 72%。^①与南非、墨西哥、俄罗斯、巴西 4 国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仅高于墨西哥,与其他 3 个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仅相当于南非的 30.2%,俄罗斯的 91.3%,巴西的 55.6%。与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前述亚洲 6 国相比,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仅略高于马来西亚,而明显低于其他 5 个国家。^②当然,从长远看,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可能会失去单位劳动成本的优势。不过,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在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管理水平、营商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等方面,与我国的较大差距很难在较短时间消除,同时,考虑到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前景,它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形成对我国的优势,虽然可以说是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无疑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2014 年 5 月 25 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将保持制造业霸主地位》的文章,得出了与我们的结论类似的想法:“所谓劳动密集型生产商将离开中国寻找廉价目的地的说法,是夸大其词。通过对众多新兴经济体 2013—2018 年劳动生产率同工资上升的对比预测,我们发现,鲜有(投资)目的地会比中国更具成本竞争力,且没有任何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幅会超过中国。”近年,即便美国搞贸易摩擦,我国的出口和外国投资仍然保持良好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竞争力并未减弱。

此外,还应看到,近 20 年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而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1995 年我国 5 类典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达到了 37.95%,而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仅为 24.51%。2003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5 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达到了 25.68%,而同期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至 45.89%,此时我国的国际贸易已告别了“卖数亿件衬衣买一架飞机”的时代。2013 年,贸易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深,5 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降至 18.80%,而同期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进一步上升至 51.00%。可见,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典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成为主要支撑。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仍然重要,但其比重却大幅下滑,比 1995 年下降了 19.15 个百分点。^③今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还会下降。因此,从出口结构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我国出口的冲击是比较有限的。这也提醒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低收入国家与我国并不在同一个竞争层次,一些低

^①单位劳动成本的定义是平均劳动报酬对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平均劳动报酬用以美元计价的实际平均工资表示,劳动生产率用以美元计价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表示(在岗职工人均 GDP)。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②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工资数据库。

^③详细情况见林岗等:《2010—2030 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4 页表 2—8。该表采用海关合作理事会(又名世界海关组织)主持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协调制度或 HS)对我国 1995—2013 年的出口产品结构的统计。考虑到 HS 编码框架没有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行详细分类,笔者参照俞升等人的研究(《中国与东盟 5 国对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7 年第 8 期),区分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也是正常的,并不会挤占我国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所占份额。

从以上对三个所谓“共识”的否定,可以得出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以较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贯彻落实,是能够得到以速度较快的经济增长的坚实支撑的。最后,还想顺便指出的是,“基数大增长就慢”这个流行看法也是可以商榷的。这个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孙治方先生曾撰文否定了,先生当年的论说当下仍然有启发意义。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制度来保障*

杨瑞龙

一、高质量发展内涵辨析

2010年底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持续性的下行,如何解读经济下行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必要重新启动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来维持高速增长,学界争论颇大。讨论中大家逐渐取得共识,那就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要素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衰变,我国经济将告别高速增长时期,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将呈现“L型”走势。如何界定这一特定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第一次提及经济“新常态”,他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重点推进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与创新驱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定义很多,莫衷一是。传统上我们通常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大量的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可能并不与经济发展同步,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结构越来越扭曲,环境变得越来越差等。因此,发展经济学家赫里克认为,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化”^①。吉利斯等更是明确认为经济发展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工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和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的上升;三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动手加入这个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使经济结构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主要参与者。”^②经济增长有可能付出环境的代价,但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并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后来提出了绿色GDP或者绿色发展,也就是在GDP基础上减去创造GDP所消耗的资源价值,再减去所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绿色发展只考虑了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但诸多社会公正等因素并没有在GDP中得到反映,于是可持续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可持续发展除了强调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外,还关注类似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社会保障、教育平等、司法公正、消除腐败等因素。

高质量发展自然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有关,但具有独立的内涵。目前理论界对高质量发展讨论出现了一些偏差性认识:一是把高质量发展当作一个“筐”,把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往里装,这会导致无法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明确界定经济范畴内涵与

*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①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外延的边界对于科学讨论非常重要,如果把影响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政治、甚至国际等因素都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范畴中,那么,不仅无法区分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范畴的区别,而且也无法明确高质量发展的讨论边界。二是把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完全对立起来。盲目追求高速度,特别是一味地通过要素投入并以牺牲环境、社会公正等为代价,这自然与高质量发展格格不入,但没有一定的财富增长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是非常困难的。消费需求增加与人均收入增长是正相关的,而人均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的,因此,在保证效率基础上的财富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把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资源、环境、社会等因素,而这些领域通常会发生市场失灵,从而得出高质量发展与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不相容的结论,即高质量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不是市场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通过提升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力来实现有效率的生长。度量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水平。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发展,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并非意味着经济增速越高越好,也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越靠近潜在增长速度越好。用要素投入盲目追求高速度必定会降低发展质量,但是远低于潜在增速的低速度甚至负增长也缺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财富基础。另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效率,它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般来说,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力越强,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越高。因此,高质量发展通常不是一个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的宏观目标,而是一个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作用来实现的微观问题。一般来说,微观主体越是有活力、市场机制越是有效率、宏观调控越是保持合意适度,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越好。经济增长的效率通常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即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也就是技术进步率。

二、实现增长动能转换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结为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当下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下行可以区分为周期性下行与结构性下行,前者主要体现为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下行,后者主要体现为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的经济下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中长期来看,自2010年底开始呈现的经济下行,大部分原因是引发过去30多年持续增长的一些传统增长要素在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衰减,从而导致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例如,改革变得越来越难,改革红利在消退;中美贸易摩擦加大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开放红利也在减少;资源、环境等约束的加大,传统工业化红利在消退;劳动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等。如果经济增速下滑主要由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导致的,那么一味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追求更高的增长速度,不仅不能导致实际财富的增长,反而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这样的发展肯定不是高质量的。

增长效率降低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增长效率不高的宏观原因与传统增长模式有关。为了实现“赶超”战略,我国在很长一时期内选择了一种以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特别是资本投入,并通过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提供廉价资本来实现增长。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由出口—投资驱动逐渐转向信贷驱动,这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导致杠杆率高企、金融风险升高,发展质量下降。增长率不高的微观原因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有关。除了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技术进步速度不高,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外需下降较快等因素外,体制约束引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不断推进,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还有较大差距,国有企业的总体经营效率还不高。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还面临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等,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着民营企业,微观主体的活力还不够。二是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还没有理顺,垄断及行政干预妨碍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在扭曲的市场机制调节

下,出现了结构扭曲、资源错配等现象。三是政府对经济活动过度行政干预降低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也加剧了经济失衡现象。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个关键措施就是尽快推动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历史上很多国家在人均GDP处于1万~1.5万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都曾发生增速放缓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发生了衰变。从一定意义上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增速放缓是一个规律性现象。问题是相当多的国家面临增速下降时,人均产出与人均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也随之下降,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却增速虽然下降,但人均产出及国民的收入水平继续保持稳定,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了高收入阶段。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该国是否实现了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我国近年出现的经济持续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所导致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更没有必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尽管传统增长动能在衰减,但还可挖掘,如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人口的数量红利衰减了,但伴随产业结构的升级,中高端劳动力成本仍具有优势,还可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传统工业化之路因资源成本、环境压力等会越走越窄,但新型工业化还有广阔的前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如加快创新步伐,由技术模仿走向前沿技术创新;继续推进以城市群一体化的深度城市化进程,发挥城市化在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由外需驱动转向内需拉动,由更依赖投资驱动到更依靠消费驱动。只要我们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稳定潜在增长率,继续维持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稳定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尽快由技术模仿走向前沿技术创新,就需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为此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需求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息息相关,在需求规模持续收缩的条件下是很难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次贷危机前,我国主要由外需—外贸—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危机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近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大,这更有必要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市场规模庞大是我国的一个优势,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有利条件;资源配置效率更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转向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体制则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而且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体制因素之所以可以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乃至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因为体制的变化可以通过产权、国家及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为经济活动及创新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从而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使用资源效率的潜在可能性。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市场体系、市场机制越是完善的体制,经济结构越是健全,资源配置效率越是高,从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空间越大,经济发展的质量越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的重要方式。

三、高质量制度决定高质量发展

我国正由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历史时期。显然,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与增长动能的转换,为此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这依赖于体制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标志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评价和度量的,而技术创新又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有些人仅从技术层面来理解创新,而我认为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创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是由制度来创造的。过去很多学者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以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制度革命。他指出,在产业革命之前,蒸汽机就已经在英国的煤矿中使用了几十年,为什么直到瓦特改良了纽科曼蒸

汽机后才发生了工业革命?答案是瓦特遇到了一个制度变革的时代,那就是当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保护创新与交易的专利制度、竞争制度、质量控制制度等,由于竞争制度的形成和对产权的有效界定与保护,进一步激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规模,这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这样一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才引发了工业革命,从而使英国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① 制度创新之所以影响与决定技术创新行为与绩效,是因为制度创新通过塑造出新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行为人参与交易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结构扭曲、资源错配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主要表现为:产品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剩产能难以消化;收入结构不合理,由于收入结构制约着需求结构,这使得传统的供给体系与现实的有效需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形成,加深了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同时着力补短板,增加有效供给。经济结构优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体制改革的深化。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结构反映的是既定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下的利益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同样,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如果增长方式不转换,体制模式保持不变,那么在经济利益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就具有刚性。此时经济结构的调整只能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历史上,我国政府多次采用各种手段去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收效甚微,甚至结构问题越来越恶化。究其原因,在利益刚性条件下,政府调结构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如此,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时,一般会导致租金的产生,这种租金就可能扭曲产业进入或退出的成本收益关系,微观主体在选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行为偏差,从而导致资源错配,发展质量下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结构调整,关键是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的深化,增长方式是难以转换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很难取得实效。

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质量的制度。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高质量制度的核心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首先,微观主体有活力。微观主体的活力大小与一定的产权结构直接相关。产权经济学大家德姆塞茨指出,排他性的产权“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形成了合理的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实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动的动力”。^②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充满活力,为此必须一方面在分类改革的原则下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必须优化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行政性垄断,向民营资本开放必要的市场与产业,加强对民营产权与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其次,市场机制有效。市场机制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形态下,市场供求、价格、竞争等要素互为因果、互相制约所形成的联结系统和运转方式。提升市场机制的活力就需要系统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是市场主体必须产权明晰、决策独立、具有硬的预算约束;二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三是灵敏有效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前提是价格能灵敏及时反映供求变化及资源的稀缺性,合理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一般的商品价格,而且包括工资率、利息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四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构建一个有序竞争、开

^① 参见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② H. 德姆塞茨:《产权论》,《经济学译丛》,1989 年第 7 期。

放、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特别是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五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

最后,宏观调控有度。所谓“有度”的宏观调控就是指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说的:“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做得太多。”^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放任式的古典市场经济,我国作为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与转型中的国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来实现国家的长远目标与弥补市场失灵。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就有可能产生寻租与创租行为,损害市场机制,降低经济效率。一般来说,市场机制越完善,政府就越容易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的行为,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干预的范围就没有边界了。为此就必须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的改革,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失位、错位,更不要越位,既避免政府“懒政庸政”式的不作为,也要防止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太长,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理论创新驱动我国高质量发展*

黄泰岩

在创新驱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中,其他创新要素,特别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及其机制学界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但对理论创新驱动作用的认识还不够,需要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

一、理论创新在创新动力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体系,是由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五大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完整有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理论创新是基础。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列宁也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复杂多变、技术变革加快对我们提出严峻挑战的今天,我们党“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②因此,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只有建立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主要体现在理论创新的引领上:

一是引领技术创新。理论创新是主干,技术创新是长在主干上的枝叶,因而理论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的方向。任正非说:“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华为正在本行业逐步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③即使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地位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及时做出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依据这一理论创新,就决定了国家强,就必须把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

^①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76页。

* 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新华网,2013年12月4日。

^④ 任正非在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上的讲话《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为祖国百年科技振兴而奋斗》, https://www.sohu.com/a/167717986_760770, 2017年8月27日。

手里,在“命门”上下功夫,为技术创新确定了发展目标和任务。

二是引领制度创新。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人工智能理论的创新和技术应用,将彻底颠覆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制度安排。同样,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也决定着制度创新的方向。从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会引发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进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形成过程中,对非公经济的认识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深化,有力促进了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对计划与市场作用的认识从结合论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深化,有力激发了市场活力,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在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形成过程中,对开放的认识从引进来到参与经济全球化再到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新体制的理论深化,有力推动了我国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整合,使我国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三是引领文化创新。我国的自然科学理论创新无疑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要追赶和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形成创新的文化、开放的文化 and 包容的文化,为我国强国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指出了方向。创新的文化,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中注入危机感,如《华为的冬天》《下一个倒下去的会不会是华为》等激励着华为的不断创新;开放的文化,就需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如华为在 5G 领域已经成为世界前沿的情况下,任正非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老鼠”;包容的文化,就是要兼收并蓄,使理论创新始终走在世界文明的大道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不仅决定着文化创新的方向,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而且社会科学创新的新成果、新体系、新话语就是对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巨大推动。

四是引领实践创新。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根据新的实践创新理论,然后再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创新,理论相对滞后了,但这并不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例如,我国的改革源头就是 1978 年小岗村 18 户村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小岗村的自发改革,只有到 1982 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以及 1983 年中共中央肯定联产承包制的情况下,才在全国农村掀起改革大潮,并向城市推广。所以邓小平同志讲:“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①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相互促进的。

由于理论创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理论创新,因而理论创新的基础地位还可以分解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理论创新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作用。

第一,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就会停滞或枯竭。科学是技术之本,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历史上虽然有四大发明,但没有形成化学、物理等现代科学,这也是近代我国陷入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正确认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一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包含了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科学是技术的先导和基础,而科学的重大发现是通过技术创新才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②二是科学发现为技术创新开辟道路。任正非在引领华为技术创新时就深刻体会到:没有基础技术研究的深度,就没有系统集成的高水准,不搞基础研究,就不可能创造机会、引导消费。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 1883 年在《为纯科学呼吁》一文中回答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的疑问时认为,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果停止科学的进步,科学的应用就会很快退化。^③三是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存在一个较长的转化过程,进一步验证了科学理论创新的基础地位。华为成为 5G 技术的领先者,就是从土耳其教授 Erdel Arıkan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2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2 页。

^③亨利·奥古斯特·罗兰、王丹红:《为纯科学呼吁》,《科学导报》2005 年第 9 期。

(2008)公开发表的关于 Polar 码(极化码)的论文中识别出信道编码的新方向,在极化码的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的结果。

第二,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创新就会受到严重阻碍。高质量发展靠创新,创新靠人才,人才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如何激发人才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新的源泉充分迸发出来,做到人尽其才,就需要推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一是确立人才创新的拼搏精神。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这就是理论的巨大精神作用。“两弹一星”的元勋们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奔赴大漠深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科技奇迹,靠的就是为中华民族振兴而拼搏的奉献精神。二是确立人才创新的制度激励。制度是激励创新的最重要保障,有效的资源配置制度可以达到最佳的创新效率,核心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组合安排;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实现最佳的创新回报,核心是解决短期与长期的激励组合安排;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确保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核心是解决产权保护与知识扩散的关系;精准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可以保障在法律框架内的自由探索,核心是确立自由探索的边界和性质。三是确立人才创新的文化动力。文化是创新的强大动力,鼓励创新文化可以形成创新思维,不断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鼓励包容文化可以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在争论与交锋中推进创新;鼓励开放文化可以形成博采众家的整合思维,在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创新。

二、理论创新供给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缺口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成为国之重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柱,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底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经济体量再大,也会陷入 1840 年的百年屈辱。中美贸易摩擦也警醒我们,没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可能公平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不可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难关受到理论创新不足的严重制约。

第一,自然科学理论创新不足对技术创新的制约。由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发达国家不可能卖给我们,因而是引不来、换不来的;同时知识和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知识更新的周期已经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5~10 年缩短到 21 世纪的 2~3 年,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基本丧失,因而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也是学不来的。这就要求我国的技术创新必须从以往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早在 2015 年的报告中就尖锐地指出,迄今,中国的大部分创新工作都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中国在渐进性创新方面成绩显著。但是,中国在“更具挑战性”的创新领域成就有限。更具有挑战性的创新要依赖科学或工程领域的突破。^②这就说明,我国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最大的短板是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创新不足。华为之所以能在 5G 上取得突破,就是因为长期重视基础研究,华为至少有 700 名数学家、800 多名物理学家、120 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他们与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形成有机的合力共同推进科技研发。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第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不足对技术创新的制约。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斯密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现,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推动了工业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从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创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0 页。

^②《境外媒体:“双创”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参考消息》2015 年 10 月 23 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5/1023/974489.shtml>。

新来看,还远没有形成指导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需要依据新时代的新特征、新矛盾、新要求进行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西方发展经济学需要从以往主要解决低收入国家推进工业化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中高收入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问题;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需要从解决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和技术赶超问题。正是由于缺乏指导发展中国家在中高收入阶段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理论学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长期难以跨越,有的国家甚至已长达50年之久。我国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

我国理论创新不足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严重制约,最终集中体现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麦肯锡2015年的咨询报告明确指出,由于科学和工程的重大理论突破不足导致技术进步放缓,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经济增长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接近一半下降到过去5年的约30%。只有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到35%~50%,中国才能在今后10年内实现5.5%到6.5%的年经济增长率。^①韩国之所以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大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力度,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994—2013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达到2.0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0%。我们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进行假设和推测^②,在两种情景下对我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预测:一是乐观情景。假定我国能够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推进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持续推动供给侧改革,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18—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达到2.3%,2021—2030年上升到2.5%,2031—2035年回到2.3%,2036—2049年稳定在2.1%,从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可以不断提高至40%以上,甚至可能达到50.4%,这就可以确保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顺利实现。二是悲观情景。如果基础研究的理论创新不足,技术创新驱动有限,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能稳定在2%以上,甚至出现下降,我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假定理论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有一个缓冲期,全要素生产率在2018—2030年增速保持在2%,此后每五年下降0.2个百分点,那么,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到2035年后就会低于4%,2045年后更是低于3%。显然,在这种情景下,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强国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对照乐观情景和悲观情景,我们发现两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终的缺口是0.9个百分点。再退一步说,按照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如果通过加大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018—2030年增速保持在2.3%,此后每五年下降0.2个百分点,那么,到2045年后我国也能保持3.5%以上的增长速度,基本实现强国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终的缺口只有0.3个百分点。所以,加大理论创新,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三、理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及其应用

理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不是盲目的、随意的,而是有其变动的规律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然科学理论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是间接的、缓慢的。自然科学的重大理论发现必须要通过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转化为技术创新,从而新技术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以及运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力驱动。例如,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1925—1928年一系列量子力学原理提出,到1939年哈恩才发现重核裂变,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54年出现第一座核电站,从此之后,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学等领域广泛使用,推动了经济社会向更高质量的发展。从前后的时间节点来看,即使从发现重核裂变到第一座核电站也经历了15年的时间。同样,从创立半导体理论到半导体产业的产生也经历了近20年的时间。1928—1929年创立半导体理论,但到1947年才发明晶体管,1962年制成集成电路,1970年制成大规模和超

^①《境外媒体:“双创”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参考消息》2015年10月23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5/1023/974489.shtml。

^②该预测由作者与博士生张仲共同完成。

大规模集成电路,从此带来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随着理论创新成果的不断积累,理论创新成果向技术转化进而形成新产业的时间会有缩短的趋势,如华为5G技术的成功,从2008年第一篇论文发表开始算起大约有10年的时间,虽然有所缩短,但仍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当然,5G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根据高通和产业调研公司发布的《5G白皮书》的测算,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产出。

自然科学理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经历的时间长、见效慢的特点明确告诉我们:要如期实现我国的强国目标,就必须及早加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描绘了清晰的时间表,2025年成为制造强国,2030年进入世界创新国家前列,2035年建成美丽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要求2020年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2025年部分技术和应用达到世界领先,2030年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对标对表这些发展目标,根据自然科学理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加快理论创新的科学布局 and 加大理论创新的力度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从我国近几年理论创新的力度来看,理论创新的未来成果并不乐观。我国虽然近些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2018年已经达到2.1%,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研发水平,但是,我国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却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别,我国主要用于试验研究,比重高达84.2%,高于美国的63.5%;而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重仅有5.1%,低于美国的16.9%,有的发达国家甚至达到20%。^①显然,我国要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优化研发经费的支出结构。

第二,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是直接的、快速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可以直接转化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个重大改革决定,每个改革决定都推出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当我们观察改革决定出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每次改革决定出台,都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984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当年经济增长速度就冲到15.2%的历史高点;199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当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4.2%;200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带来了一直到2007年的持续高速增长;201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形成了我国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见效快的特点明确告诉我们: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弥补自然科学理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起步阶段见效慢的不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快速持续的驱动力。这就需要在加快自然科学理论创新布局的同时,重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加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要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创新提供理念和方向上的指引,形成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发展思想、战略安排和政策框架,真正在思想上、制度和具体政策措施上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正确揭示出影响和制约我国推进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加快创新的重点、路径、工具和方法等,使创新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真正落实、落细、落小;总结世界各国推进创新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发现创新的客观规律,为我国推进创新提供有益借鉴。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为激发全民创新活力,特别是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创新活力和激情提供动力和制度保障;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强化知识产权的认定和保护,为加快科技创新奠定坚实的产权基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通过要素自由流动形成有效创新激励。三是坚持构建更高层次

^①《任泽平: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全球视角》,泽平宏观, <http://money.163.com/18/0722/20/DNBIAVRF00258105.html>, 2018年7月22日。

的对外开放体系,特别是在美国对我国技术创新进行绞杀和遏制的情况下更要扩大对外开放,为创新提供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对外开放升级,进行创新的全球布局,充分整合世界创新资源;在加强对发达国家开放的同时,加快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进行全球市场资源整合,为创新提供强劲的市场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第三,理论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需要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组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快理论创新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组合作用,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规律。但是,对于理论创新而言,市场与政府的组合作用会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理论创新的性质决定的。一是理论创新不具有排他性,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一旦被认可就成为一般知识,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二是理论创新成果很难定价,无法估算。三是理论创新竞争极其残酷。因此,理论创新的性质决定了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完全或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理论创新就不可能达到最佳产出水平,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和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据统计,在美国的研发投入中,企业占比为 71.7%,政府占比为 11.3%,高校占比为 13%,私人非营利机构占比为 4%;我国相应的占比分别为 76.8%、16.2%、7%和 0。我国政府占比虽然高于美国,但高校占比远低于美国,高校研发主要是用于基础研究。从其他发达国家来看,德国、韩国、日本 2013 年研发经费中高等院校的占比分别为 17.68%、12.58%和 9.05%,都远高于我国。^①

理论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需要市场与政府有效组合的经验和实践告诉我们:加快理论创新,就必须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投入的多元化结构。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较单一,政府投入占了 90%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多元投入机制存在较大差别。这就需要:一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高企业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基础研究对企业生存和长期成长的作用,从华为和中兴的结果中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二是发挥高校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高校研发投入占比,特别是通过产学研合作和各种捐赠增加研发投入。三是发挥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引导它们参与基础研究,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责任编辑:胡家勇)

(校对:谭易)

^①《任泽平:中美科技实力对比——全球视角》,泽平宏观,<http://money.163.com/18/0722/20/DNBIAVRF00258105.html>,2018年7月22日。